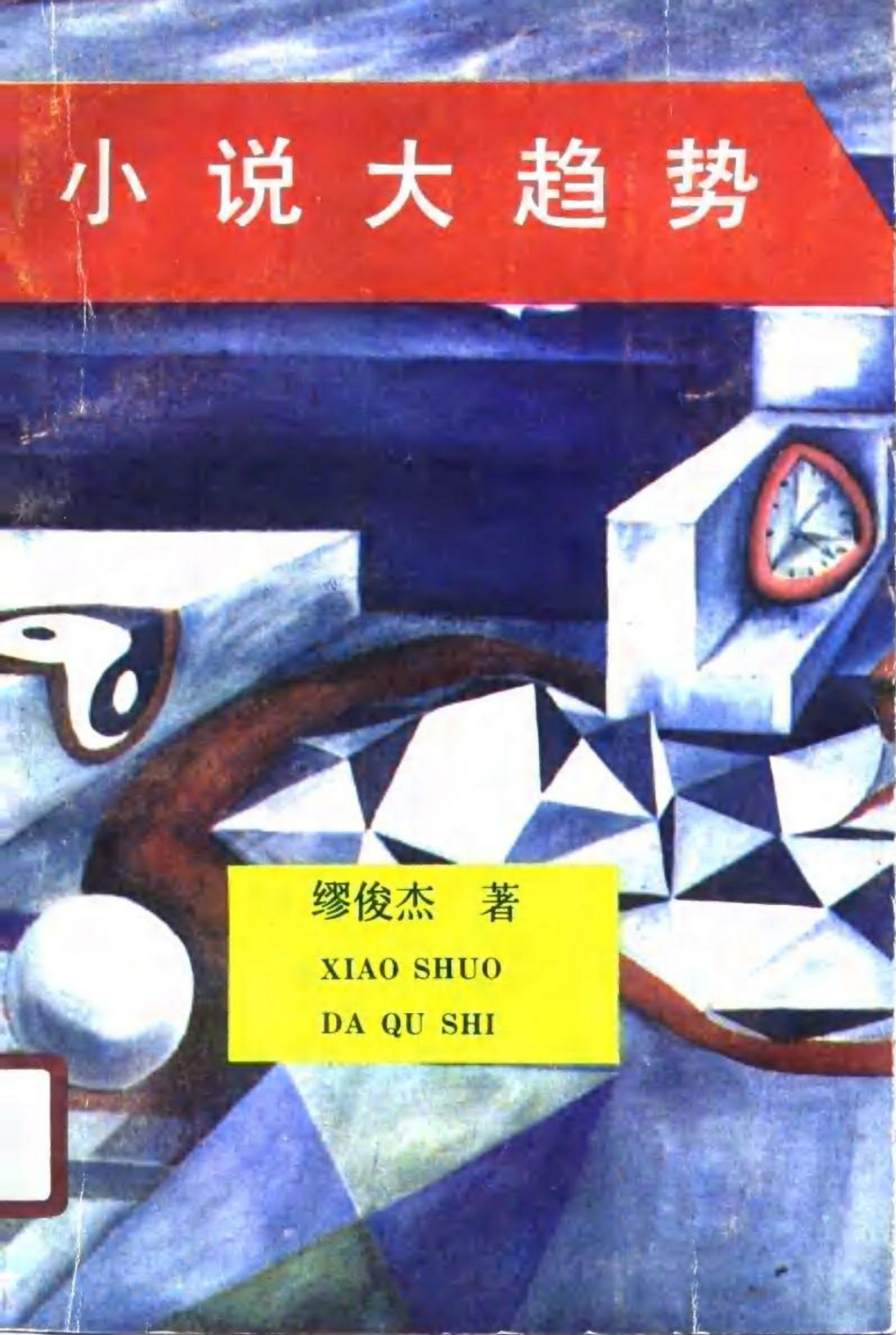


小说大趋势

缪俊杰 著

XIAO SHUO

DA QU SHI



小说大趋势

廖俊杰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6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2 字数312,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30册

ISBN 7—5407—0594—9/I·445

定价: 5.80元

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创作方法 和流派初探

(代序)

我国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十年光辉的历程，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和研究工作者们正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来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经验。但从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方面来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则还很少，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

新时期的小说主要采用了哪些创作方法？有没有形成文学流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创作方法和文学流派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和层次的作家，观察世界、选择题材、塑造形象所采取的观点和方法不同或有所差异，创作了不同内容、形式和风格的作品，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方法和不同的流派。茅盾说

过：“创作方法有多少种，文学流派也有多少种。”（《夜读偶记》）这说明创作方法同文学流派是相联系的。

我们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方法可能比较简单一些，要谈文学流派问题就复杂了。首先，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流派，意见就不一致。其次，如果以创作方法为标准来划分流派，有的作家采用多种创作方法，那么他应该算哪一个流派？所以，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讨论、争鸣，不能一下子作结论。从我国文学史上来看，文学流派很多，什么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西昆体、元和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等。划分文学流派的标准各不相同。有的以题材来划分，如唐朝诗坛上有田园派和边塞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多描写自然景物，表现田园生活，因而得名田园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派，多反映戍边生活，歌颂将士英姿，因而得名边塞派。有的以风格来划分流派，如宋朝词坛上有婉约派和豪放派，柳永的词婉约纤丽，苏轼的词则热情豪放。有的则以明确的文学主张来划分流派，如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崇尚瘦硬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

西方文学中划分文学流派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以法国文学为例，有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派，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派、批判现实主义派以及自然主义派，是以创作方法为标准来划分流派的。到了二十世纪，则主要以文学主张为标准来划分流派。从二十年代起，法国每隔五年、十年就有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出现，几个志同道合的作家凑在一起，起草一个宣言，由某个杂志发表出来，然后出几本杂志或几本小说，一个流派就诞生了。但过了不几年，这个流派又为新的流派所代替，转眼之间销声匿迹。在西方世界，不断崛起的新思潮，随之便出现各种

各样的文学主张、文艺理论、文艺流派。单就现代派和现代主义来说，就有什么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抽象派、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荒诞派、新小说派、反小说派、先锋派，等等，真是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

从中外文学史上文学流派形成的历史来看，大致有这样几个基本条件：一、有共同的文艺纲领或文艺主张，有以文会友所形成的社团和本社的同人刊物；二、有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国际性或全国性）的作家作为领袖或主帅；三、有一批人师承或追随这位主帅，并形成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艺术风格；四、这一流派的作品反映了某一地域或某一历史时期的共同的生活内容。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待文学流派问题，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流派，例如三十年代出现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及“新月派”、“礼拜六派”、“象征派”等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等，也可以算做文学流派。

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十年来的新时期文学是否形成了文学流派呢？对这个问题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有人说有，有人说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关于新时期的文学流派，不能机械地按照过去传统的流派观念去套，如果硬要按照这“四条标准”去套，恐怕就很难说有什么流派。关于新时期文学流派应该理解得更宽泛一些，条件放宽松一些。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总目标下，有相同的或比较接近的文学主张，表现相近的生活内容或题材特色，有比较相近的审美倾向和美学追求，采用大致相同的创作方法，具有相近的艺术风格的作家，就可以构成一个文学流派。在新时期的十年中，以地域为特色，形成了许多作家群，

大致就可以把他们看作为一个个文学流派。我们赞成茅盾同志的说法：“创作方法有多少种，文学流派就有多少种”。我们主张用创作方法为标准来划分我国新时期文学的流派。当然这里面又复杂了。有的作家同时采用几种创作方法，有的前期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后期改为象征、意象的创作方法；有的前期采用象征、意象的创作方法，后期又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的作家根本就不赞成你把他划分为什么流派，认为自己什么流派也不是，“我就是我”。有些作家之所以“不愿入流”，恐怕也是有原因的。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流派问题上也使许多作家蒙难受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有的流派打成“宗派”，进而上纲为宗派集团、反党集团，致使人们长期以来一谈流派就“望尘却步”。

其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并不是不谈流派。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谈论过古典主义派、浪漫主义派和自然主义派等流派问题。列宁评论过浪漫派、现代派，是承认流派的。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谭派、杨派、余派、言派……都要有！”1956年党所提出的“双百”方针，就提倡不同流派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也谈到创作流派和理论学派的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讲艺术流派。我们在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经验时，研究一下新时期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问题，对于丰富我国文学的表现方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是有积极意义的。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状况，我主张以创作方法和作家的艺术追求为标准来划分文学流派。这样我想把新时期文学大致分为四大流派：一、现实主义深化派；二、象征写意派；三、文化寻根派；四、荒诞魔幻派。下面分别谈

谈我的看法。

二

以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为序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开始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清算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文艺上出现了发扬现实主义传统、进一步使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潮流。这股强大的文艺思潮就形成了我国文坛上具有强大实力的“现实主义深化”派。如果说文学流派，这是我国新时期文学中最大的一个流派。

“现实主义深化”派，从创作主张来说，至少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强调文学向生活靠近。他们打破了“四人帮”搞的“瞒和骗”的文艺模式，主张恢复文艺“写真实”的功能，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主张文艺更靠拢生活，发挥“干预生活”的积极作用；第二，强调文艺向人民靠近。他们主张文艺要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人民的呼声；发挥文艺对人民的教育功能，使文艺成为“国民精神的火光和引导国民前途的灯火”。这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基本方面，新时期的文学发扬了这个传统，在现实主义上达到进一步深化，这就使这个流派在我国文坛具有强大的实力。

“现实主义深化”派文艺，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问题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发展阶段，直到目前的“纪实文学”，十年间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峰波 的创作浪潮。从创作实力来说，大批老、中、青作家都集合在“现实主义深化”的旗帜下。这里面有坚持写作的老作家和成名较早的

中年作家，如丁玲、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姚雪垠、韦君宜、秦兆阳、魏巍、陈登科、刘宾雁、艾煊、茹志鹃、韶华、李准等等；有在新时期成长或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中年作家，如陆文夫、邓友梅、鲁彦周、高晓声、蒋子龙、刘心武、张贤亮、冯骥才、李国文、张洁、从维熙、徐怀中、谌容、张弦、张一弓、古华、杨佩瑾、周克芹、胡石言、黎汝清等；有新时期涌现的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如李存葆、柯云路、贾平凹、朱苏进、铁凝等。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在现实主义深化方面具有某些相同的特色。如果按创作方法和艺术追求比较接近这一点来说，把他们看做是一个流派大致是可以的。

这一创作流派，仅就小说创作来说就有令人惊喜的成绩。如果以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先后为序，其代表性的作品，从《班主任》、《伤痕》开始，《东方》、《天云山传奇》、《内奸》、《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大墙下的红玉兰》、《乔厂长上任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啊》、《剪辑错了的故事》、《将军吟》、《黄河东流去》、《西线无战事》、《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天山深处的“大兵”》、《内当家》、《洗礼》、《沉重的翅膀》、《那五》、《人生》、《高山下的花环》、《围墙》、《花园街五号》、《绿化树》、《新星》、《燕赵悲歌》、《拂晓前的葬礼》、《井》、《秋天的愤怒》、《桑树坪纪事》、《阴错阳差》、《钟鼓楼》等等。这些作品总的特点是，真实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情绪、愿望或呼声，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或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使现实主义走向了深化。

在“现实主义深化”方面，蒋子龙、李准、刘心武、柯云路等的作品具有代表性。蒋子龙的创作，从《乔厂长上任记》

开始,《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锅碗瓢盆交响曲》、《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直到最近的《阴错阳差》、《蛇神》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生活中的矛盾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发现,并且敢于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并着意刻画站在生活前列的开拓者形象,通过他们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他的作品,无论是《乔厂长上任记》还是《开拓者》、《燕赵悲歌》,直到最近问世的《蛇神》,作者都善于以广阔的时代为背景,揭示当前改革中的前进力量与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给人以气势磅礴的印象。《阴错阳差》则以冷峻的态度揭示潜在于生活激流深处的漩涡,从而折射出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向生活靠拢和向人民靠拢,面对现实,揭露矛盾,构成了蒋子龙创作的鲜明特色。

刘心武是以对当代生活作出敏锐反映的现实主义试作《班主任》走上文坛的,这篇带有“伤痕文学”特征的作品,表现出作家靠近生活、靠近人民的创作意向。此后,他在《如意》、《立体交叉桥》等作品中,着意探讨北京的市民社会的变迁。这一市民社会主要是以一个个四合院为中心构成的一个个多家庭的小社会,或者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从而构筑了北京市民社会特有的风俗习惯和伦理精神。他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虽然表现手法与前者有所不同,但仍然发挥了他创作的特点,以北京钟鼓楼附近一个小四合院九户人家在一天里所发生的事件,深入开掘了北京市民生活的深层结构和他们的文化心理、道德风尚。而他的三篇纪实体小说《五一九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和《王府井万花筒》则发挥了文艺与人民相联系的特点,仍然以北京市民的生活境遇和感情波澜为基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群众在新的时代和生活条

件下的疾苦和呼声。这些作品都是现实主义走向深化的具有标志性的作品，尽管在艺术成就上有着程度的不同。

在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传统培育成长的作家李准，在新时期创作的主要成果是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长期以来，他把自己的创作热情都投入描写农村的变迁，比起他早年发表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来，这部作品熔铸了他三十多年的创作经验和生活积累，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进一步走向深化。它是以黄河流域农民大迁徙为线索，以七户农民家庭在大浩劫中的悲欢离合命运以及在逃难途中可歌可泣的事迹为主要情节，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色彩斑斓的史诗般的图景。它从中原大地的历史和人民的生活变迁中，揭示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主题，我们的伟大人民不只具有善良、勤劳、人道的品格，而且还具有勇敢正直、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在滔滔黄河中不会沉没的船。作品所塑造的李麦、徐秋斋、王跑、海老清、海长松、蓝五等一系列人物，不同程度地具有典型意义。《黄河东流去》在新时期文学中，可以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丰碑，也是“现实主义深化”派的代表作之一。

在青年作家群里，柯云路是“现实主义深化”派的代表之一。从他的处女作《三千万》开始，《耿耿难眠》、《历史将证明》，直到《新星》、《夜与昼》，都以开掘现实生活的矛盾的深度和体现时代精神的鲜明性为主要特点。《新星》为什么在读者和电视观众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就是因为它贴近现实、贴近人民。它充分展开了改革中存在的矛盾，把阻碍改革的落后、愚昧的守旧势力揭露得淋漓尽致，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诸如干部中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敷衍渎职、平

庸无能以及部分群众中的封建守旧、愚昧迷信、无政府主义、狭隘自私等，都给予无情的批判。《夜与昼》并不是《新星》的续篇，整个故事与古陵已无多大关系，而是在京都的广阔的生活层面上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表现各种人物的心态。但从对生活 and 人们心理的解剖上，同样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深化。

近年来，由于各种新浪潮的冲击，在创作方法上对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借鉴，“现实主义深化”已经谈得很少了，“写真实”、“干预生活”、“镜子”等积极的文学主张甚至遭到嘲笑。但是“现实主义深化”这个创作流派并没有销声匿迹。许多成熟的作家仍然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曾经以《小贩世家》、《美食家》、《围墙》而著名的陆文夫，近年来又发表了现实主义的中篇力作《井》，深刻揭示了潜藏在生活中的封建主义的暗流对于人们精神的戕害。冯骥才发表了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中篇小说《感谢生活》。在创作方法上进行大胆探索的王蒙，近年来发表了《名医梁有志传奇》、《新大陆人》、《活动变人形》等中、长篇小说，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倾向。在青年作家中，山东作家张炜，继《秋天的思索》之后，又发表了《秋天的愤怒》，揭示了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出现的新的矛盾和斗争，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进一步走向深化。青年作家朱晓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桑树坪纪事》、《桑塬》和《福林和他的婆姨》，以陕西北林游山区为背景，通过对李金斗、许彩芳、王志科这样一些人物的描写，开掘了积淀于生活中的底蕴，揭示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也显示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趋向。这也是现实主义走向深化的新成果。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文学的发展，一些深刻反映现实矛盾的作品，如《唐山大地震》、《洪荒启示录》、《中国的“小

皇帝”》等，都表明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对作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现实主义深化”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还是作为一个文艺流派都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三

我国新时期文学在摆脱了过去“左”的思潮的影响以后，很快出现了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向。就创作方法来说，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许多作者开始了借鉴西方艺术表现方法的尝试。主要是从创作方法上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象征”、“隐喻”、“抽象”、“写意”等手法，形成了中国式的“象征写意”派。就其内容来说还是现实主义的，主要是创作方法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于是也有人把它称为“开放的现实主义”，以区别西方的现代派。

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的“象征写意”派称为开放的现实主义呢？因为从内容上看与西方现代派有很大的区别，很接近于现实主义，只是表现手法上与现代派有某些相似。西方现代派文学从总的倾向来说，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物质、自然和个人与我之间的畸形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在欧美现代派文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派别是象征主义。1857年法国象征主义派的先驱人物波德莱尔发表了诗集《恶之花》，揭露了巴黎这座“现代地狱”般的城市的种种罪恶，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人物内心的微妙世界，通过暗示、烘托、对比和联想，以象征的手法来反映人的内心世界，这同现实主义以反映现实的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比象征主义略晚一些，又出现了表现主义。它要求表现事物的内在实质，揭示

人物的灵魂，展示永恒的品质和真理。在表现手法上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梦境和潜台词。这种表现主义以二十年代的德国和美国为中心，并且直接影响了六十年代兴起的西方荒诞派戏剧。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是表现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审判》和《变形记》是表现主义的代表作。而在欧美各国，包括英、美、法、德等国影响最大的是“意识流小说”。这种小说主张突破现实主义小说的框架，深入到人的意识的深层，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手段来显示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这种“意识流小说”得名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的人的思维活动是一般流水的概念，后来又受到弗洛伊德和柏格森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英国作家詹姆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嚣和狂乱》是运用“意识流”方法写的小说的代表作。

我国作家在打破了思想和艺术的封闭状态以后，开始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借用“意识流”手法和象征、写意的手法。但是，他们的艺术始终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内容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形式则借鉴了“意识流”等外来手法，形成了开放性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蒙、宗璞、邓刚、张承志、王安忆、陈村、祖慰、莫言等。

在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反映我国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王蒙的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王蒙是一个勇于进行探索的作家。他早期的作品，如《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青春万岁》以及粉碎“四人帮”初期的作品《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等，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但从《春之声》开始，他的一些作品，如《蝴蝶》、《杂色》、《深的湖》、《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直到

最近的短篇《铃的闪》，大都采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这些作品着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审美化，也就是以作家自己所创造的人物的内在意识为展开情节的线索，随着意识的流动再现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感受和思想过程，其重心放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展示人物的内心图景。在《春之声》里，主人公岳之峰没有什么语言和行动，作家主要写他在闷罐车里的心理活动，写他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而这种联想有很大的随意性和跳跃性。例如，写岳之峰脑子里出现的各种闪回：“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这里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没有什么逻辑的联系，是人的意识的自由流动。作品通过岳之峰意识的流动，人物心灵的激荡，给读者树立一个命运坎坷却对祖国对党充满着赤诚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蝴蝶》同样是通过“意识流”手法来表现人物命运的一篇开放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度过了漫长的革命历程、经受了各种严酷考验，几经沉浮、命运复杂多变的老干部。他从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变成一个赫赫有权威的市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又突然变成被“革命造反群众”接过来扭过去的“活靶子”，又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被人们遗忘的“老张头”。十年动乱结束，他突然又得到升迁，成了国务院一个副部长。整个故事通过张思远从农村回北京，下了飞机乘汽车回机关的一个短暂时间内对自己经历的回忆，时序颠倒，故事纷繁。作品把反映社会矛盾的焦点聚集在人物心理的发展过程上，着重剖析主人公的心灵世界。《杂色》对于主人公曹千里的描写也是如此。作品没有多少故事和情节，只讲了一个灰溜溜的中年人和一匹灰杂色的老马在一个上午的一段非常平凡的活动。然而，曹千里的坎坷的

经历以及他如何变得浑浑噩噩的性格，都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而表现了出来。这与现实主义追求细节的真实性和精确的个性描写有着显著的不同。王蒙的这些小说明显地表现出象征写意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蒙的小说是象征写意派，也即开放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在象征写意方面，邓刚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也是具有代表性的。邓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过一些作品，而这篇成名作却不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的。它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刻画了两个不畏艰险、敢于在大海中搏风击浪的勇士形象。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姓甚名谁，何许人士，作品均没有交待，只是两个性格的象征。老海碰子深沉老练，富有在海上搏风击浪的高强本领。他看不起年轻没有经验的小海碰子，象征着饱经风霜而又有相当保守性的老一代；而有勇气、有智谋、有现代化装备、同样看不起老人的小海碰子象征着新一代。老少海碰子的矛盾象征着两代人的“代沟”。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新老两代人的思想感情逐步走向融合，象征着在新的时代面前，勇敢与智慧、经验和科学的“接轨”。内容是现实主义的，形式是象征主义的，这也表现出作品的开放现实主义的特色。

运用象征写意的手法表现我国社会生活的作家中，张承志也是一个代表。他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某些技巧相融合，把情节融汇到主人公的意识流动之中，使作品的人物、情节、意境、哲理得到多层次展现，扩充了作品的内涵和艺术想象的空间。《黑骏马》是一首优美、悲怆、激越的歌。汉人白音宝力格自幼丧母，被父亲送到白发奶奶的蒙古包里，与奶奶和她的亲孙女索米亚一起投进了大自然的怀抱。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他们相互爱慕，成为恋人。当他发现索米亚被草原恶棍黄毛希拉奸污并有了身孕，便下定

决心离开草原，去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生活。十四年后，他怀着追悔和负疚之情回到草原，重新找到了已经成为草原新女性的索米亚。作品通过这对恋人的悲欢离合，表现出主人公沉重与苦涩、感伤与柔情、眷恋与慨叹的心境和情绪。从作品所表现出的韵味和手法来看，似乎受到苏联吉尔吉斯族作家艾赫玛托夫风格的影响。《北方的河》同《黑骏马》一样，也是一首激越凝重的歌。作品通过一个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的遭遇及其对生活的追忆，展现了一代青年的奋斗、思索与追求。作品也不过分追求故事和情节的连贯性，而是着重于写意，把大自然的拟人化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思索者，也是一个奋斗者，他对于事业的追求，使他失去了爱，但却找到了事业和青春。作家以大写意的手法描写了北方的河的景观和风貌，通过自然和心灵的交汇，在象征意味上，揭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力量和壮阔的民族精神。从创作手法上说，与王蒙的“意识流”、象征、写意的手法非常相似。所以王蒙对于张承志的小说作了无以复加的热情的赞叹。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来说，采用意识流、象征、写意手法来表现中国社会生活的作家，当然不只王蒙、邓刚、张承志等几个人。有不少作家，从他们创作的主要基调和主要手法来看是现实主义的，但某些作品也采用了“意识流”或象征、写意的手法。例如湛容的《人到中年》，作品对于中年知识分子陆文婷的命运和心境的描写，多少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宗璞的《弦上的梦》、《三生石》和《我是谁》，着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同时也用象征、隐喻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思想意蕴。蒋子龙的《蛇神》采用了时序颠倒的手法来叙述故事和表现人物。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

平湾》以抒情的散文笔法，以写意为主，描绘了陕北黄土高原的当今风貌。许多青年作家也是以表现中国社会生活为内容，采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在创作上表现出某种探索。

我们之所以把以王蒙、邓刚、张承志等为代表的这种创作方法或创作流派称为象征写意派，或称为开放的现实主义，而不称为中国的现代派，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始终以中国的社会生活为支点，象王蒙那样以“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为支点，把象征写意的手法融汇到自己的作品中，不脱离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这种创作手法对于我国文学的渗透并没有影响我国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秀传统。对于这种创作倾向，我们还是要给以积极的肯定和估价，不能因为它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而加以排斥和贬责。

四

在很多作家热衷于“横向移植”，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的同时，有一部分作家又提出了“文学寻根”问题。湖南作家韩少功在《作家》1985年第四期上发表了《文学的“根”》，提出了“文学寻根”的主张。该刊还发表了刘心武、李杭育等人的文章，对寻根进行探讨。接着《文艺报》从七月开始，刊登了《他们在寻根》的“理论动态”，开辟了“关于文学寻根问题的讨论”专栏，发表了阿城、李陀、郑义、周政保、贾平凹、周克芹等人的文章。其它一些报刊也相应开展了讨论，于是形成了一股“寻根热”。在创作实践上也出现了一些称为“寻根”的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乌热尔图的鄂温克草原系列小说，以及汪曾祺、阿城、郑义、韩少